

仓卒珠盘玉敦间 待凭口舌巩河山

——晚清收复伊犁始末

◎ 郭晔旻

鸦片战争以后，“天朝”的梦幻逐渐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所打破。曾经傲然将一切外国视为“藩属”的中华帝国被迫降尊纡贵，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在晚清的外交史上，充斥着割地赔款的屈辱，而曾纪泽通过谈判索还伊犁，总算让黯淡的晚清外交中呈现出了几缕亮色……

趁火打劫

近代史上，西方列强侵略时惯用的一个伎俩是以尊奉国际法或是所谓的“理论”作为粉饰剂，施展暴行，却把自己装扮成正义的使者。沙皇俄国正是个中老手。据说法国的拿破仑在论及国界的战略意义时曾认为，山岭是国家之间“天然的界限”。假如这一看法确实不错的话，《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外兴安岭倒正是一条山岭构成的中俄“天然国界”。但在19世纪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双重标准”是帝国主义者才可以采用的特权，将拿破仑的话奉若圭臬，时不时将“天然国界”挂在嘴边的沙皇俄国在否定外兴安岭的“天然界限”，将中俄东部边界推至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同时，也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西部边疆。1864年，沙皇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虽然已经通过这个条约攫取了中国西北多达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欲壑难填的沙皇俄国并不以此为满足。《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墨迹未干，签订这一条约的俄国代表巴布科夫就已经叫嚣要把“中国西部的边界向东推移三百到五百俄里”，将新疆的塔尔巴哈台（塔城）与伊犁地区都并入俄国。而理由就是中俄国界只有这样沿天山与阿拉套山而行，才能形成俄国与中国“紧密的天然界限”！

几乎是《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的同时，新疆爆发了反抗清政府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受到沉重打击，仅能勉强保住塔尔巴哈台、哈密及巴里坤等处。各地反清起义者在各地建立了许多互不统属的割据政权，这使得觊觎已久的沙皇俄国寻到了各个击破，实现梦寐以求的“天然界限”的时机。1871年3月，沙皇统治集团决



崇厚像

心侵占伊犁，被当时的中亚人民称为“叶里木帕夏（半个皇帝）”的俄国中亚总督考夫曼下令“采取进攻行动惩罚塔兰奇人（指伊犁的维吾尔族居民），迫使他们尊重俄国的政权与武力”。5月3日，由俄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率领的俄军侵入了伊犁，经过整整50天的激战，全部侵占了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当时人口13万的伊犁地区。

沙俄政府在俄军占领伊犁以后立即训令驻北京公使通告清政府已经“代为收复”伊犁，并信誓旦旦地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意把伊犁地方并入帝国”，“干预中国西部事务的唯一目的是帮助中国人在帝国西部各省恢复其政权”。至于这个诺言的诚意几许，只需看看俄国同时开出的归还伊犁的条件——只有等待关外肃清，中国军队克复乌鲁木齐等各城后，才可以把伊犁地区交还中国——就可以知道，侵略者不过是在欲盖弥彰。实际上，在当时西北地区发生大

规模起义，清军由河西走廊入疆的道路早已被阻断的情况下，沙俄殖民主义者认为中国根本无望收复新疆，因此才放心开出这么一个“代为收复”的空头支票。科尔帕科夫斯基在1871年7月4日进入伊犁宁远城之后就得意忘形地说出了真心话：“伊犁永归俄籍，俄国所占地区，将永远不归还中国！”更有人甚至叫嚣：“中国对伊犁的权利，正如西班牙对荷兰、英国对美利坚合众国和土耳其对希腊王国的权利一样，已经丧失。”作为七河省长的科尔帕科夫斯基随后悍然将伊犁地区直接纳入了他的统治，在占领军司令部下设立专门处理伊犁事务的特别办公室，将俄占中亚的行政管理架构全盘移植到了伊犁地区。甚至无理要求中国派员前往伊犁办公事前必须向俄国提出申请，如无俄国发给的路照，“即行捉拿”，俨然已将伊犁视为俄属七河省的一部分。富庶的伊犁地区随后变成了“俄国中亚领土中财政收入最高的部分”，俄国每年从这里榨取的赋税不下数十万两白银，摊在3万户居民头上，平均每户每年纳税10两以上；贪婪的沙俄军事当局尤嫌不足，甚至公然在伊犁种植鸦片，光是1874年一年就通过经营罪恶的鸦片买卖赚到33万卢布。

崇厚出使

出乎沙皇俄国的意料，被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在平定西北起义后竟然率领清军完成了收复新疆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876年8月到1878年2月，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清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窃踞南疆十二年之久的阿古柏集团，收复除伊犁之外的全部新疆土地。正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1878年6月2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派吏部左侍郎崇厚出使俄国相机办理伊犁交涉。

当年52岁的崇厚是满洲镶黄旗人。在洋人眼中，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但并不是一个外交家”。他所具有的外交知识与经验是十分有限的，其值得津津乐道的外交经历是在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奉命赴法国“谢罪”，并得到了英国外交官“无论如何要比一般中国官员有礼貌”的“高度评价”，却同时也被美国外交官轻蔑地称为“资质异常愚鲁”。曾担任驻英法公使的郭嵩焘对崇厚的评价也很低，认为此人“名为知洋务，徒知其可畏而已。是知其势，而不知其理，于处办洋务终无所得其心也”。但出于平衡朝中满汉势力的需要，在汉臣左宗棠收获武力粉碎阿古柏集团

的大功之后，出使俄国办理收回伊犁事宜的荣耀还是落到了身为旗人的崇厚身上。清廷对崇厚也是寄予厚望，先是赏戴双眼花翎、头品顶戴，又加太子少保、内大臣等衔，并授为“头等全权钦差大臣”，实指望这位满洲勋贵能够人到地还，不辱使命。谁知此时的八旗子弟不但已经失去了先祖们驰骋于金戈铁马的战场豪情，连往昔索额图等入于尼布楚谈判时纵横捭阖的风采都已不复存在。此后的历史表明，崇厚的这次出使就外交而言变成了一场闹剧，而就中国而言更是变成了一场悲剧。

虽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当时从北京出使当时的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横穿欧亚大陆腹地的陆路，另一条则是坐船经中国海、印度洋穿过苏伊士运河再经过地中海到达法国马赛以后再转乘火车前往俄国的海路。陆路虽然艰险漫长，但可以途径西北，所谓“议新疆必先知新疆”，可与当时最了解伊犁实际情况的左宗棠预先商讨谈判对策，结果崇厚却依旧在“对国际外交上的错综复杂情况和伊犁的地理状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选择了较为舒适快捷的海路。或许崇厚以为此行不过履行一下手续，即可轻松完成接收伊犁——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得知清使前来谈判的消息之后，沙俄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中亚总督库夫曼坚决反对将伊犁归还中国。沙俄的外交部观点正与之相反，主张依照诺言交还伊犁，但这就像日后谈判所证明的那样，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或是担心什么“国际信誉”，而是唯恐一味坚持霸占伊犁会使俄国丧失在华利益，而让英国坐收渔人之利。相形之下，俄军参谋总部亚洲司司长，日俄战争时的俄国满洲军总司令库罗巴特金则显得更为狡猾，一方面声称“就所处的位置而言，伊犁是一个现成的、威慑力量极其强大的堡垒。因此从军事上看，我们必须占领伊犁”；另一方面又主张，“如果我们由于已经轻率的许诺而不得不归还伊犁的话，则必须要求中国赔偿我们这8年来用于该地区的费用和俄中贸易方面的损失”，对于赔偿的金额，更是狮子大开口一样索价一亿金卢布（大约56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廷一年的岁入的70%），用来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其长远目的是通过这条铁路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最终，俄国统治集团部分采纳了库罗巴特金的提议，决定以归还伊犁地区的一部分为诱饵，换取在华商业的特权，并勒索一笔“军事占领费”。



俄国财务大臣维特(1845年—1919年)

不战而败

1878年的最后一天，在经过两个月的漫长旅程之后，崇厚抵达圣彼得堡，受到了俄国人居心叵测地隆重接待。他从下榻的旅馆乘坐一架6匹马拉的皇家马车，连随从也被乘坐一架4匹马拉的皇家马车，在俄国宫廷典礼官伴随下驶入皇宫。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召见使团，整个觐见仪式用清政府官员的话来说就是自始至终“优礼有加”。这番情景与20年后李鸿章访俄时受到的超高规格待遇如出一辙，足见俄国人对晚清官场尚虚荣、重排场的嗜好已是了然于胸。

如俄国人所愿，在随后的谈判中，已经陶醉在俄国人“相待如礼”之中的崇厚果然对俄国人“惟以诚意相孚”。俄国人强词夺理地要求清廷“补恤俄民”，偿付其“代守”伊犁数年的费用，其清单中甚至包括即将为“中国人白得的一些俄军建造的漂亮营房”——按此逻辑，占领伊犁期间的赋税似乎更有理由归还清廷——索价500万卢布（即使按照俄国人自己的估算，“占领费”也不应超过225万卢布），崇厚竟不还价，照单全收。至于俄方肆无忌惮地提出的其余两大要求，“通商、分界”，崇厚同样是大慷国家之慨。不仅干脆利落地答应了允许俄人通商——这张清廷唯一可打之牌，甚至转过来替俄国人的领土要求大说好话，他告诉清廷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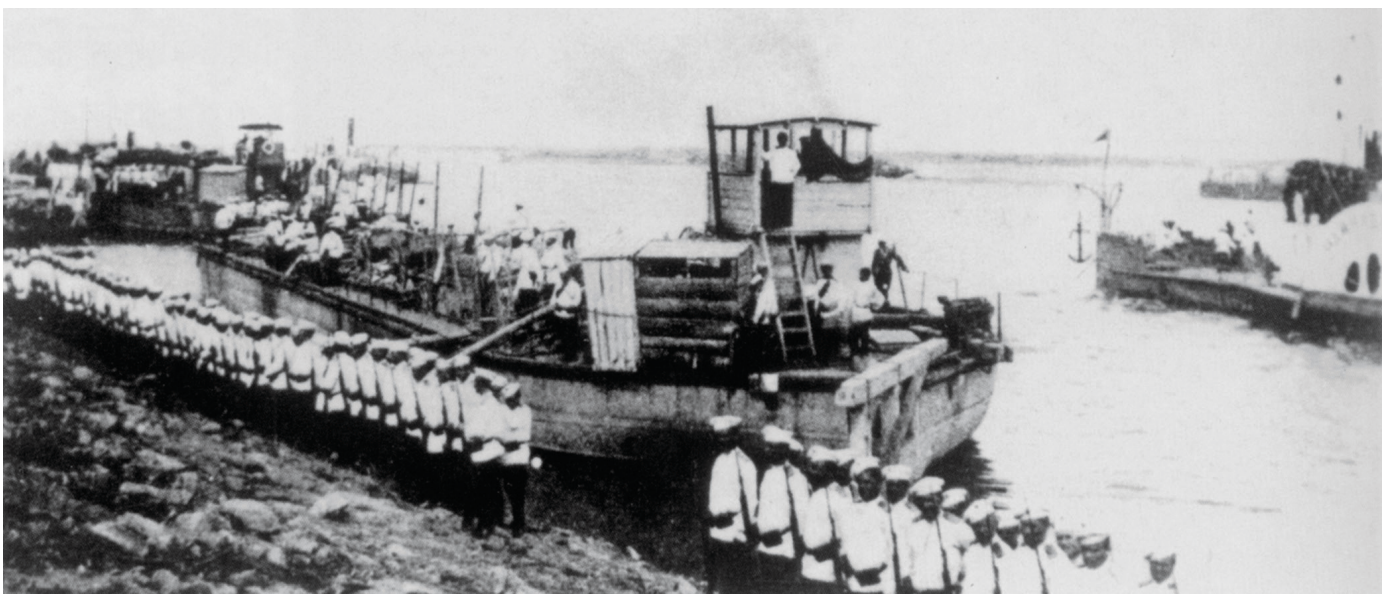
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来由于伊犁战略地位重要，“俄国论者咸谓必不可还”，可是沙皇和俄国政府为了两国友谊，“一定会归还伊犁，绝无图利之心”；但是归还伊犁后“力量稍弱，故不得不稍宽其界以为自固”！言下之意仿佛俄国已是大吃其亏，大清国“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竟将伊犁好好安坐而得之”，自当割地补偿一般。如此谈判对象，怎么会得不到对方的竭诚欢迎！

1879年10月2日，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今雅尔塔附近）沙皇行宫，崇厚与沙俄外交大臣格尔斯签署了收还伊犁之约，即《里瓦几亚条约》。签约之后，崇厚将条约内容电报禀告国内后，竟不待清廷答复就匆匆登船启程回国，连沙皇俄国的外交官在谈判中也敏锐地觉察到“专使（指崇厚）似乎急于结束这个问题”，于是更加“我愈急，彼愈缓；我愈退，彼愈进，不餍其欲不止，餍其欲方止”——而此中真实的原因不过是得知夫人蒋氏在北京罹患重病，崇厚早已无心军国大事，草率了事只为儿女私情罢了。

崇厚前脚刚走，格尔斯就开始兴奋地欢呼：“（通过这个条约）俄国从中得到的东西已经超过了甘愿冒战争威胁来保持的东西！”也难怪这位外交大臣在“归还”伊犁之后反而如此兴奋，在这个总计十八款的《里瓦几亚条约》里，中国将给予俄国商人广泛的商业特权，并向其开放位于帝国腹地的张家口至天津及嘉峪关经西安至汉口的贸易路线——而此前中外历次不平等条约中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均在沿海地带；中国将赔偿俄国500万卢布（约合中国库平银280万两），用来换取俄国交还伊犁城；但与此同时，中国却要將霍尔果斯河以西和伊犁以南之特克斯河谷，包括伊犁通往南疆阿克苏的咽喉要道，穿过天山的穆扎尔特达坂（非著名的达坂城）的数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伊犁地区的十分之七）土地割给俄国。条约的内容一经公布，顿时在欧洲舆论界引起一片惊愕：“这些条件，只会是战胜国强加与战败国的，但绝不能是由两国普通交涉的结果所产生的！”这确是一个外交上的“奇迹”，但它就是发生了。几年后的中法战争，最后谈判出了一个“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结局，若是套用这个说法，那就是崇厚出使的结果，是中国“不战而败”。

激辩改约

《里瓦几亚条约》签订后的中俄两国可谓是冰火两重



沙俄军队抢滩哈尔滨旧照

天。那边厢，沙俄统治集团弹冠相庆，叫嚣道：“为了使我国舆论满意，必须大力宣扬我们从中国方面所取得的商业和战略上的利益！”这边厢，清廷上下已是一片哗然。对于这样一个仅仅收回一座三面受敌、无以自守的伊犁空城，却丧失大量领土和政治、经济权益的不平等条约，连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向主和的恭亲王奕訢也认为吃亏太多，签了不如不签，却又担心“既允后翻，其曲在我”，会触怒沙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清廷于10月8日下旨，要求各督抚大员“筹画复奏”。

督抚们的回复可谓是五花八门。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楨认为俄人要挟太甚，主张拒绝批准《里瓦几亚条约》，但又说万不得已时可“光明正大许以不索伊犁”，等于将崇厚所订条约和中国收回伊犁两作罢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态度则更为软弱，虽然也认为崇厚所定俄约在界务和商务方面损失过多，但更担心如果不批准条约则容易引起边界战事，那时俄国所要求的必定要比现在更多，“俄约行之确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建议清廷干脆自认倒霉了事。唯有一直在西北前线“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愤怒不已地表示：“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北境二百里间皆俄属部，孤注万里，何以图存！”力主首先重新谈判力争和平解决伊犁问题，如果沙俄拒不交还，即以武力收复伊犁、驱逐沙俄侵略者。

虽说疆臣们意见不一，朝堂之上却是一片倒的斥责之

声。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体芳在1880年1月2日上奏，谓崇厚专擅误国，请朝廷重治其罪。与黄体芳同为“翰林四谏”的“清流党”首领张之洞随后更是洋洋数千言上疏清廷，“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是有新疆尚无如无新疆也”，“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

在“清流党”与手握重兵在新疆与沙俄对峙的左宗棠坚决反对签约的促动下，清廷的实际统治者，正在“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也表示“此事委屈已久，不意（俄国）要挟至此，万不能忍。若再从之，上不对祖宗，下不能对天下臣民”，终于下定决心重治崇厚，坚决拒约。2月12日，清廷明发上谕，宣布崇厚“违训越权”，所订条约“窒碍难行”，不予批准。另以曾国藩长子，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时任驻英、法公使）为出使俄国大臣，出使改约。与此同时，在一片“国人皆曰可杀”的声讨中，崇厚被革职拿问，送交刑部治罪，很快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斩监候），关进大牢只等秋后问斩这一刀了。

临危出使

如何处置崇厚原本是清廷的“家务事”，大臣由于办理外交（起初叫“夷务”）不力而送掉性命的在大清国的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20多年前的1858年，宗室耆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派往天津与英法联军交涉时仅是未请旨而擅自回京就获罪赐死，何况崇厚属于“目无君父，贻害国



曾纪泽像

家，其罪甚于耆英百倍”呢？谁知，这一回却引起了“友邦惊诧”，彼此间勾心斗角的列强们居然结成了统一战线，一致要求清廷赦免崇厚——这恐怕不是因为他们与崇厚间有多深的“友谊”，而是担心如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就要被处以大清国法的话，那今后帝国主义列强们还能找谁来“谈判”呢？当然，名义上的理由依旧是冠冕堂皇的“对企图用外交的惯例去解决国际纠纷的一个外交大臣所受到的待遇表示愤怒”。以发明罗马字母标注汉语发音系统——威妥玛注音——而著称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致函总理衙门，“新约不准，俄国已觉失望，崇厚治以死罪，俄人尤以为大辱……衅端自此而开，深愿先有以解俄国之辱，俾得从中调停”，法国的使臣宝海与美、德驻华公使也表达了与威妥玛同样的意思，甚至于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居然也降尊纡贵，亲自以私人的名义致电慈禧太后请求赦免崇厚。

至于沙皇俄国，眼看崇约被拒，煮熟的鸭子要飞走，更是恼羞成怒，赤膊上阵对清廷进行恐吓。俄国驻华临时代办凯阳德闯入总理衙门，声言无论如何俄国都把对崇厚的任何处罚都视做“中国有蔑视俄国之心”——因为在与崇厚的谈判中，为了“友好”，俄国政府才“特排众论，将不应让与中国之处全行相让，岂知愈让愈不见好”。在这番颠倒黑白的“解释”之后，干脆图穷匕见地表示：“俄国并非无力量，至条约准与不准，在俄国总是一样！”

沙俄的外交官在北京咆哮，沙俄的军队同样忙碌起来，在东起乌苏里江西至喀什噶尔的漫长边境上，俄军开始针对中国进行动员集结。在西线，中亚总督考夫曼早就扬言“我们迟早要实现这一艰巨的（并吞准噶尔与喀什噶尔地区）的使命”，此时更是迫不及待地制定了入侵中国的全面计划，准备调集约二万九千人的兵力攻占整个新疆。计划中的先头部队第一步兵旅旅长，曾在数年前潜入阿古柏盘踞的南疆进行勘测调查等特务活动的库罗巴特金狂妄地叫嚷：“我所指挥的部队……士气是旺盛的，一旦下达前进的命令，是会受到部队热烈欢迎的。”在东线，俄军紧急调运了12万人的正规军，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彼岸对中国虎视眈眈。一时间，中俄边境战云密布。这还不够，当时尚停留在彼得堡的沙俄驻华公使布策对清驻俄参赞邵友濂扬言，由海军上将勒索夫斯基率领的由二十三艘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已从黑海开往日本长崎——准备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一举封锁渤海、黄海，威胁北京！侵略者的气焰十分嚣张！

正是在俄国的外交恐吓与武力讹诈并举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情况下，1880年3月3日，曾纪泽在法国巴黎接到总理衙门电报，得知清政府派自己兼任驻俄公使、赴彼得堡改约。乍得消息，曾纪泽就感到此行如同“欲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决心在“重于界务、宽于商务”原则下，“多争一分，即少受一分之害”，在谈判桌上与沙俄周旋到底。他在给即将离任的邵友濂的送别诗里，表示自己要“仓卒珠盘玉敦^{*1}间，待凭口舌巩河山”！

虽说曾纪泽的勇气可嘉，才识也绝非“徒知洋人可畏”的崇厚可比。然而《璦琿条约》、《北京条约》的往事可鉴，在

道、咸之际，初办外洋交涉，多不得当，丧失权利，在在皆是。耆相国英在粤东，与英人所订之条约，皆非当面折冲，派家人张禧偕首府某公出而协定。当时请旨赏张五品顶戴，以壮观瞻。此事太近儿戏，余初未之信。后有戚某公为广州知府，曾调取当年原卷阅看，果有此事。至咸丰七、八年换约期间，因耆相定约债事，赐令自尽。固由文宗之怒，实怡、郑二王等乘君之怒以成之。耆平日实有自取之咎，因宣宗朝曾奖耆“有守有为”之语，于是耆相大书一联悬之客厅，云：“先皇奖励有为有守；今上申斥无才无能。”此罢官时考语，故意令人见之。此联轩輊两朝，含有阳秋，有人言之当权者，此自造杀身之祸也。

——[清]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左宗棠克复新疆战图

外敌强兵压境下清廷被迫签订的城下之盟，又岂是“使臣不力”一语可以推脱的呢？在列强们的“炮舰外交”面前，中国只能是能战方能言和，批判的武器终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曾纪泽实在应该庆幸，这次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终于“雄起”了一回，第一次敢于对沙皇俄国的武力威胁说“不”。

1880年3月1日，大清朝廷以惊人的高效率在一天之内连发七道上谕，下令整顿南、北洋海防与新疆、蒙古和东北的边防，以备俄人“伺隙启衅”。清廷上下同仇敌忾，“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也亲自出马在京城督促神机营振武练兵，装备新式枪炮；甚至连一向对“塞防”不感冒、曾经主张放弃新疆的李鸿章在受命驻天津“密筹防务”后亦表示“时艰至此”，“我辈只合以血诚报国耳”！激励直隶诸军将士，为国效力尽忠。而左宗棠更是在新疆厉兵秣马，决心非将伊犁“收回不可”。在新疆前线的三路清军共合马步军4万余对盘踞伊犁的俄军形成了两路夹击、一路断其退路的包围之势。对开战的前景，左宗棠充满自信，“生力军络绎而至，足供指挥，今岁天下大熟，关内外粮价平减，尤于师行为便，天赞我也”！为了便于就近指挥，1880年5月26日，年近七旬的左宗棠“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亲率后续部队出关，将西征军大本



左宗棠西征所铸铜银

★1 珠盘：用珍珠装饰的盘子；玉敦：玉制的盛器。特指古代歃血为盟时所用的礼器，此处引申为外交谈判。

营从肃州(今酒泉)移到哈密——与大本营车仗随行的还有一口左宗棠预备盛装自己遗体的棺木，主帅誓不生入玉门关的气概使清军的士气为之大振！所谓“外交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帝国已经准备好有效地使用武力”，正是由于清军的调兵备战使俄国的军事家们感到“中国的实力难以估测，不相信中国是不堪一击的”，才让曾纪泽在谈判桌上能够“尚有凭藉，多说几句硬朗话”！

唇枪舌剑

曾纪泽料理完在英法两国的事务后，于1880年7月25日从巴黎起行，7月30日抵达俄国首都彼得堡。一到彼得堡，就得到驻俄英使带来的消息，谓俄国外务大臣格尔斯曾对英使说过，崇厚必须赦免。当8月4日曾纪泽前往俄国外交部要求安排呈递国书日程时，也被格尔斯严词拒绝，一再强调中国治罪崇厚等问题影响到中俄谈判的启动。崇厚的命运居然成为再也绕不过去的谈判障碍。面对欧洲强国的压力和俄方的“下马威”，清政府被迫做出妥协，8月12日，清政府明发上谕，开释崇厚。足见在列强环伺的近代中国，想真正地自主一下，是何其之难！至于这位捅了如此大篓子的崇厚，倒可以多说两句。1884年，崇厚捐献军饷白银三十万两以赎罪，得以原官位降两级予以使用，1893年，崇厚于67岁时去世。最滑稽的事情发生在他身后，清王朝覆灭12年后的1922年，仍住在紫禁城里的废帝溥仪大婚，不知出于何种想法，居然开恩为崇厚平反，颁布“上谕”：“御前侍卫花翎头品顶戴正红旗满洲都统衡永之父，二品衔原任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双眼花翎都察院左都御史崇厚，着开复原官、原衔翎支。”实在令人无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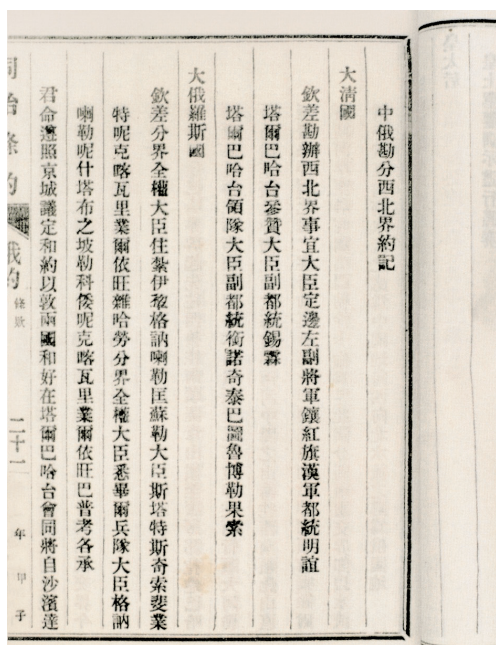
崇厚被释放了，俄国人终于找到了台阶下。8月22日，满意地让曾纪泽递交了国书。在他们眼里，即将开始的谈判无非是又一次送上门来的敲竹杠的机会，曾纪泽不过是第二个崇厚。由于了解到伊犁南部的特克斯河流域对中国太过重要，沙俄统治集团决定重施与崇厚谈判时的故技，以归还特克斯河流域为诱饵，与中国进行“巧妙地讨价还价”，“最主要的是不能无偿地把特克斯河流域让回去”。对于究竟榨取什么，各部门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财政部认为重要的是“商业优惠”，把归还领土作为“向中国讨取商业利益的手段”。外交部认为本质问题是“取得我们边境上的正常与巩固状态，以及我们实际上的商业利益”。至于

那位实际上代表了陆军立场的中亚总督考夫曼，想法更是丰富，忽而提出一亿卢布的赎地费，忽而要从伊犁北部划出相当于特克斯河流域一样大的领土来交换。甚至全然不搭界的海军部也来凑热闹，主张在对俄远东海军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以西地区割占一块土地。正当他们的丰富想象力在要土地还是要金钱之间徘徊时，谈判开始了。

从1880年10月到1881年2月，马拉松式的谈判持续了4个多月。因为在贪婪与忍让、敲诈与宽容之间是有限度的。谈判一开始，曾纪泽就主动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允割让伊犁西境之地予俄，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谁知沙俄得寸进尺，10月6日，布策倨傲地声称不能将伊犁“白白送与中国了”，如果中国以特克斯河流域要紧，欲请俄国退还中国，就“必须为俄国想一地步，始可让还”。所谓“地步”，就是要“中国须另让地土，补偿本国”，甚至像做买卖的生意人一样“启发”道：“中国沿海地方，何处可让？”对此，曾纪泽的回答铿锵有力：“伊犁地方，系贵国交还者，非贵国让给者”，“从今以后，中国土地，断无再让之事”！

虽说索地碰壁，但俄国外交部一想到以往和清政府打交道的“美好往事”，又重新信心十足地认为：“中国政府被逼得走投无路，而我们的态度又是继续向他们施加一种有效恐怖的话，那么他可能接受赔款的原则。”10月20日，俄国外交部的高级顾问热梅尼给曾纪泽算了一笔账，由于中国方面拒绝《里瓦几亚条约》，所以俄国不得不设防添兵，并派舰队去中国，为这几项支出，俄国已经花掉1200万卢布，假如谈判还没有结果，那就会花到2400万，甚至更多，而这笔钱迟早要算到中国的头上。11月8日，热梅尼抛出了一份正式照会，要求“中国赔补俄国备兵设防之款”，“本国既因中国所逼，以致费此巨饷，理应向中国索赔，方照平允”。明明是俄国出兵威胁，双方并未开战，却要向中国勒索兵费，厚颜无耻真是莫此为甚了，更要命的是，一旦开此先例，就很难说各列强会不会有样学样，事无大小既派兵船来华“打秋风”了。幸而曾纪泽洞察其中的利害，义正词严地指出“这是国际公法中没有先例的要求，人们曾见某些国家在战后要求赔款，但从未见过要赔偿和平时期的军备费用”，如果俄国向中国索赔兵费，“请问中国所费兵饷，又向何国偿索”？索要兵费一事，“中国断难应允”！

眼见曾纪泽绝非崇厚第二，看走了眼的沙俄当局恼羞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成怒之下干脆图穷匕见，扬言“不应只限于举起拳头，而且要有准备和有决心去使用这个拳头”，并公然恐吓道：“若再延迟，不如打仗合算！”对此，曾纪泽的回答堪称鸦片战争以后饱受西方列强武力讹诈的清廷外交的最强音：“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数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中国不能让者，无论贵国有若干兵船，中国定不答应！”

色厉内荏

按照鸦片战争以后多年来列强与中国打交道的惯例，这就算是曾纪泽摊牌，谈判谈崩了。接下来的流程就该是撤使、断交、开战了，尤其是热梅尼在给外交大臣格尔斯的信里已经毫不隐讳地说：“这些中国老爷们熟悉世界政治，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只有痛打他们一顿，才能使他们老实下来”，“只有把枪口对准他们的喉咙上的时候，才肯答应（俄国的要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为什么不打呢？正是在同一封信里，热梅尼泄露了“天机”：“但是我将承认这种必要的做法对于我们枯竭的财政来说是十分困难的。”

是的，当时的俄国根本“打不起”这场与中国的战争。就在中俄就伊犁问题进行交涉前的1877至1878年，为争夺

巴尔干半岛的霸权，沙皇俄国刚刚发动了第十次俄土（土耳其）战争。虽然俄军以20万人死亡的惨重代价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但在随后列强干预下的《柏林条约》中却失去了大部分战争成果。俄国已经被这场得不偿失的战争拖得国穷财尽，一年的财政赤字高达5000万卢布，仅仅为了伊犁的军事行动，沙俄向西欧国家举借的外债就高达1.52亿卢布。俄国的陆军大臣早就在哀叹“无论是财政上的理由或军事上的理由，我们都不能作战了”。

除了“打不起”，当时的沙俄也没有“打得赢”的十足把握。当时的俄国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对刚刚征服中亚的希瓦、布哈达和浩罕三个汗国的统治，同时又正在向土库曼斯坦用兵，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俄国一开始在军事上稍有失利，就将有损它在亚洲的威望”。而连当时英国驻俄国的武官也已经发现“如果中国真心作战，俄国在中亚细亚集结的兵力是远远不够的”。虽然沙俄的西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长巴布科夫曾经狂妄地宣称“俄国的一个步兵连能打败一千个中国人”！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天山南北的不到三万俄军面对左宗棠麾下用当时最先进的西式枪炮武装起来的六万“经过十年不断行军的老兵结合成为的一个战争体系”，是没有什么胜算的。特别是在伊犁地区，俄军人数只有数千人，重型火炮不足十门，用这样一支兵力和火力都极为有限的军队去抗衡被消灭阿古柏集团的胜利所鼓舞，为收复固有领土伊犁的正义所激励的三万七千清军，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连热梅尼都感到“我们这一漫长的边境线上武装太少，只要一告急，就会迫使我们手忙脚乱”，“在这种情况下还想保住伊犁省的一半，是极为无益的”。而在其他战线上，俄国的东西伯利亚总督也沮丧地承认，用紧急动员起来的部署在东西伯利亚的一两万俄国陆军入侵中国东北的林海雪原，甚至“连‘红胡子’（指中国东北一带的武装土匪）的进犯，都对付不了”，而那支派往远东庞大的俄国舰队，还没派上什么恐吓中国的用场就由于俄土关系的再度紧张必须召回欧洲“加强我们的舰队”对付土耳其。至于余下的远东舰队，甚至俄国军界都对其不抱希望，称之为“没有力量干出什么大事来”。

“打不起”又“打不赢”，“火上浇油”的还有一个“不敢打”。当时俄国的内部危机已经严重到最高统治者沙皇的人身安全都受威胁的地步。19世纪70年代，俄国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民意党”，在它的影响下，针对统治集团的恐怖

事件也逐渐增多。1879年4月，发生暗杀沙皇事件；11月，沙皇专列火车被炸；1880年2月，冬宫被炸……就在曾纪泽的谈判结束后1星期，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终于没有逃过被民意党人刺杀身亡的命运。沙俄政府已不能自信通过再一次对外战争能巩固其统治地位。在伊犁问题上，色厉内荏的沙皇俄国陷于“一个冒风险的、劳民伤财的、危险的战争和一个‘不体面的’、不可靠的、暂时的缓和以等待时机”两种侵略政策中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

无故妥协

正当胜负的天平已经逐渐向清廷倾斜的时候，不愿看到清政府向沙皇俄国做出太大让步影响到自己在中国庞大的商业利益，但更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取得抗俄斗争的完全胜利后建立起反抗列强自信的英国人决定干涉，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与李鸿章建立起“深厚战斗友谊”的查理·戈登出场了。作为大清朝的“老朋友”，戈登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出，大沽炮台易于被敌人占领，无法保障天津与北京安全，中国如果要同俄国开战，需要“先毁北京城郊，疏散档案，迁皇帝至内地……俄殊不能为害”！这话与其说是在好心建议还不如说是在恶意恐吓，是在赤裸裸地“提醒”慈禧太后不要忘记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迫使咸丰皇帝和她自己仓皇“北狩”热河的悲惨往事——这简直是清廷连想也不敢想的可怕场面！

戈登的话音未落，向来主和的李鸿章就与其沆瀣一气，帮腔上奏曰：“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被击中“阿喀琉斯之踵”的清廷终于决定在谈判中妥协，一方面电令曾纪泽“如能多争几条，固可藉以转圜，万一十八条竟不能挽回，无论如何定义，较之布策来华，多方挟制，仍处于不得不允”，授权他向俄国做出更大让步；另一方面，以“正须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的名义，下诏将左宗棠调回北京！究其原因，无非是坚定主张“俄事非决战不可”、又握有重兵的左宗棠呆在西北前线对“和局”显得太过“危险”，从而施以帝国官场惯用的“明升暗降”的伎俩，剥夺其新疆兵权罢了，这与二十多年后慈禧太后行将就木前将袁世凯调离北洋军，到北京任军机大臣的手段实在异曲同工。在俄国人自己也承认“从陆路上向北京进军是不可能”的情况下，左宗棠到北京顾谁的问呢？难

道叫在西北征战多年的左宗棠去天津处理海防？那还要北洋大臣李鸿章干什么呢？明知如此，终究君命难违，期待“从新鼓铸，一振积弱之势”的左宗棠也只有感叹壮志未酬空余恨，黯然踏上了回京“陛见”之路。

颇有点黑色幽默的是，明明是清廷在自撤藩篱，沙皇俄国却没有读出清廷诏书中“字里行间”的意思——洋人终究不能领会天朝博大精深的“厚黑”之术。得知左宗棠被召回京时，俄国统治集团非常震惊，怀疑是主战派得势，清政府已下定开战的决心。沙皇下令外交大臣格尔斯务必将中俄条约“及早定议，免生枝节”，格尔斯于12月11日匆匆会见曾纪泽，急忙向他打听：“听说左宗棠现已进京，恐怕会挑起战争，不知确否？”还假惺惺地说：“中俄两国和好200余年，若为不值一提的小事就打起来，实在是不合情理”，早先咄咄逼人的侵略气焰已经荡然无存。对此，明了左宗棠进京内情的曾纪泽也只能“笑而不语”了。

故土重归

此消彼长之下，谈判桌上的双方立场开始接近。曾纪泽虽然坚决拒绝了俄国以侮辱性的“兵费”名目勒索赔款的无理要求，但也表示“贵国如欲加代守之费，中国可以答应”。而俄国人在中国以“代收代守”的名义取代“兵费”之后，终于放弃了不切实际的以特克斯河流域换取领土交换的幻想。

对财政拮据的沙俄来说，无论是以什么名义，反正中国的赔款是多多益善的。热梅尼就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注重实际，而不在于名词概念”，“无论兵费不兵费，总算是俄国要钱”。但已经和曾纪泽打过交道的热梅尼脑子毕竟比较清楚，晓得同僚们头脑发热开出增加1200万卢布赔款的“天价”是在白日做梦：“在《里瓦几亚条约》的500万之外，再加上1200万，就是1700万了！整个伊犁省也不值这个数目。中国人会认为，省下这笔赔款用于加强自己的军备，迟早总会收复这个省。”果然被他言中，曾纪泽的回答正是：“倘要1200万卢布，中国情愿打一仗，再出此款。”因曾纪泽的坚执与斗争，沙俄被迫将增加的赔款减为400万卢布。曾纪泽基于“界务稍有更改，则兵费不能不加”的认识，为尽快结束谈判，避免俄国人再节外生枝，最终同意增加赔款400万卢布。至于通商方面，《里瓦几亚条约》中嘉峪关至汉口一段中俄陆路通商路线也被曾纪泽成功删去。



新疆收回伊犁八城中俄分界图

1880年12月27日，俄方将谈判成果写成备忘录送交曾纪泽，格尔斯颇有些不甘愿地对曾纪泽说：“中国再不满意，则俄国另有办法，不能与贵爵再举一条、二条朝夕辩论矣！”所谓“另有办法”，无非是在虚声恫吓，这早已无济于事了。经过几个月的谈判，格尔斯终于明白：“讹诈不能使他（曾纪泽）害怕，所以于他不能报任何幻想。”在最后阶段的谈判中，曾纪泽仍旧与俄国代表“逐日争辩，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不肯苟且迁就之意”。这与当初崇厚只求早日签约回国的态度，不啻云泥之别。

1881年2月24日，中俄两国全权订约签字钦差大臣曾纪泽和格尔斯、布策在彼得堡俄国外交部正式签订《中俄伊犁条约》——顺便说一句，这也正是左宗棠抵达北京的同一天。中国在这个条约里虽然仍旧被迫割让了伊犁西境的大片土地并付出了总计900万卢布（约合500万两白银）的赔款，但终于收回了被崇厚稀里糊涂割让出去的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的二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其他一些权益。这虽

然不能称之为中国的“胜利”，也可算是左宗棠所称的“败局中之胜著”。毕竟，如当时的英国驻俄公使德佛楞所说，面对扩张领土的贪欲有如饕餮的沙皇俄国，“中国逼使俄国做了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她已经吞进的土地”，而曾纪泽本人也成为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帝国“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因为他“光荣地用和平方式收回了伊犁”。对于曾纪泽在谈判中的表现，对手格尔斯也不得不表示钦佩：“我办外国事件四十二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以贵爵之才智，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材也。”

1881年8月19日，曾纪泽再次代表清政府在俄国交换了条约批准书，《中俄伊犁条约》正式生效，中国西北边疆的危机因此而最后解决。1882年4月30日，由金顺率领的清军进驻阔别已久的伊犁；完成交接的俄军被迫撤离，结束了对伊犁长达十年之久的“代收代守”。几经波折之后，全疆乱而复平，伊犁失而复得。✶